



现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及其变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崔世广

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型”是怎样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如何,未来会向什么方向演变?本文试对其加以探讨。

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内涵

1. 战后价值观的成立

所谓价值观,实际上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对社会行为进行是非、善恶等意义判断的总和。笔者认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国家、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对家庭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追求的认知和态度。尽管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社会,特别是在稳定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难以保持统一、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价值观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

在战前的日本,绝对效忠天皇、国家,为了天皇和国家而奉公灭私甚至献身,一直占据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心。与这种观念相互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支撑之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个人生活中的禁欲主义。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国家执行了一条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路线;而且,作为献身目标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剥下了罩在自己身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当时的日本人一时失去了效忠的对象。

另外,由于战败日本处于被占领之下,失去了主权。由美军占领军总部民政局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删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和灌输进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新旧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交替,再加上当时人们由于缺吃少穿,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使战后初期的日本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价值混乱。

然而,进入50年代,日本已渡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阶段,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渐渐步入正常轨道。这时,社会的发展开始向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相继制定了劳动关联法案、罢工规制法等,对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以限制,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手段来致力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方面也认识到,为了使企业获得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不能轻易解雇工人,从而开始实行终身雇佣制。这使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为之一变。由于企业与职工关系的相对固定化,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职工可以从企业等工作场所得到自己预期的一切,这大大密切了职工和企业等的关系,使过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转变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的忠诚。对每个人来讲,企业等工作场所已不仅是劳动的场所,获得经济来源的场所,还成为充实人生和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再加上战后新宪法、民法所规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的贯彻,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导致了原来传统家族共同体的解体。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带来了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日渐缩小,“核家族”化迅速进展。家庭共同体的变质,促成了新型家庭观念的成立。

另外,物质生活的充实、生活安定化,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涛巨浪的荡涤下,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已彻底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识的解放。

总之,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宪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2. 战后价值观的内涵

这样,到高速增长长期,新型的战后价值观确立起来。概而言之是,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天皇转向了企业等工作场所,从传统家族共同体走向了现代家庭,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解放。

第一,“工作场所至上”。

从国家共同体、天皇走向了企业等共同体,这是战后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核心内容。例如,在70、80年代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中,对天皇“无感情”的国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为各调查项目的首位,而对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国民之和也不过50%左右;而且,年龄越小“无感情”的比率越大。这说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已大大失坠。但是,必须承认,战后日本仍是一个社会、集团志向很强的社会。调查表明,日本人的“社会志向”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社会贡献意识”也较强。然而,具体到“社会志向”的内容,却不是志向“社会正义”等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的层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边,如企业、学校、官厅等“中间”层次。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日本的大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公司领导和职工都是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把公司搞好。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被解雇,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还受到公司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而且,由于实行年功序列工资制,人们按部就班晋升,公司领导和职工的工资相差不多。这使职工对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对日本人来说,考进一个公司,也就变成了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与公司有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自己的一切都与公司有密切联系,没有公司就没有自己,所以都想把公司搞好。工会也是如此。工会成员也是公司大家庭的一员,所以罢

工时也不过分地同公司领导斗争，罢工大部分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而且，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许多日本人开始把公司当做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将企业视为实现人生意义的地方，把为企业做出贡献和牺牲作为终极价值来追求。

这样，工作场所将人生价值、传统社会取向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内”。

在战前的日本，家的意识、家业延续、重视纵式的亲子关系是家族观念的基本内容。战后，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和民法，“个人的尊严和两性的本质的平等”的原则得到贯彻并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家庭和观念的重大变化。

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后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家。从祖母到孙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族，到高速增长长期变成了夫妇与孩子的单世代同居型家族（核家族）。据统计，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为68.2%，1975年已达到74.1%。其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逐步贯彻，法律保护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再次，家庭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废除，家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敬神祭祖的功能大大减弱，生产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费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诞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专心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性别功能分担型家庭。

也就是说，虽然战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内持家，一直是战后日本人认可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1973年对“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舆论调查，“性别功能分担”居首位（39%），以下依次为“夫唱妇随”（22%）、“家庭内合作”（21%）、“夫妇自立”（15%），说明日本人中“男主女从”的意识依然很浓。另外，据日本总理府所做的“关于妇女的舆论调查”，1987年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意见的男性为51.7%，女性为36.6%；不同意这种意见的男性为20.2%，女性为31.9%，对上述观点首肯的仍占多数。而且，这样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结构，也并没有给日本人的夫妻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总理府1982年对全国20-59岁的女性进行“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比较调查”时，对夫妇关系感到满意的高达82.5%。

第三，从禁欲主义到物质欲望的肯定。

在战时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很大限制，关于性的表现也受到很严的取缔。但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积极肯定和极大满足，特别是性风俗的变化，令人吃惊。

首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不断丰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扩充了日本人的物质欲望。从60年代的“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到70年代的“3C”（彩电、空调、私家车），从“厨房革命”到美国消费文化的登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革命，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也不断在满足中爬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人所指出的对精神、心灵的追求不断降低和丧失的问题。

另外，对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扩展着。50~60年代，日本社会围绕着性道德、性描写、性生活发生了很大动摇。关于性表现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宪法下权利意识增强的是“查太莱审判”。1959年，因翻译出版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翻译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译者和出版社社长被判有罪。但围绕这个问题，全社会爆发了量刑会否侵害作为宪法的基本争论，结果成为围绕性问题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

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这部使用木偶表示多种性交体位，并对其体位和产生的快乐加以解说的书，积极肯定女性的性欲，将女性作为性交主体来论述。因此，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66年卖出了152万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但是，价值观的变迁，也并不是像人们想做的那样，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突变。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1973年，对婚前性关系认为“不可”的仍为58%，认为“订婚后可以”、“有爱情可以”和“无条件可以”的分别为15%、19%和3%。1988年各项的结果则分别为39%、23%、31%和4%。由此可见，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识，也并没有达到泛滥的地步。

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战后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战后价值观在形成和确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文化之风的侵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无疑为90年代后的深刻变动打下了基础。

二、90年代以来的变化

1. 社会环境的变化

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萧条，金融破绽、奥姆真理教事件、阪神大地震等彻底打破了日本的“安全神话”，日本人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日本人的价值观又面临新的考验，发生着重大的转折。

社会经济环境之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逼迫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首先，过去按工作年限和年龄决定工资的日本企业，近年来为了有效分配人员费用和改革职员意识等目的，纷纷导入年俸制。这是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代表的日本型雇佣形态正在崩溃的表现。不管年俸制的内容如何，现在实施实力主义、实绩主义的工资制度，或研究实施的企业在不断增加着。

另外，也进行着工资体系的改革。例如，小田急电铁从1997年度将工资制度变为“目标管理”。管理人员在年初制定当年的目标，由全体干部组成的评议会议对其进行审查，分三阶段决定月工资和业绩奖等。在三井造船公司，已经从1996年5月改变管理职位的工资制度，即将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能力工资，奖金也随事业部的业绩而变动。从业人员方面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1996年8月，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以男性上班族为对象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对能力主义化持“不能简单决定”、“疑问”等否定性评价的人约占45%，“赞成”的为54%，肯定派占上风。而且，从年代来看，40岁左右的中年层比起青年层来支持率更高。对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修正和改革，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职工和企业的共同体意识和一体感，使职工对工作场所的忠诚度发生质变。

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安也引起了家庭的变化。一方面，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破产者和失业者增加，这对不少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大潮中，随着企业忠诚心的变质，产生了回归家庭的潮流，家庭的避风港功能增强。

而且，近年来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妇女就业的增加。由于受西方女权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再加上少子化的进展，不少妻子自立自强的意识日益增强。她们开始不甘心做丈夫的附属，许多人走出家门步入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促进男女平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自然受到冲击。

再次，“泡沫经济”的崩溃，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也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日本人价值观的变化。

2. “讨厌的忠诚心”

在企业渐渐改变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不断采取大规模的裁减人员措施来压缩成本的现实面前，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发生很大变化，是非常自然的。

对“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舆论调查，是观察日本人对企业等忠诚心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总理府多年来一直进行这样的一项调查：“你认为今后日本人比起个人利益来应重视国民整体的利益呢，还是比起国民整体的利益来应重视每个人的利益呢？”。从总体来看，虽然认为比起个人利益来更应重视全体利益的人始终占优势，但90年代以来重视全体利益者比率下降（1991年为45.3%，1997年降到39.4%），重视个人利益者比率上升（1991年为24.0%，1997年上升为31.2%），二者呈接近趋势。

这说明，日本职工对工作单位的满意度，对社会的归属意识已明显下降。

1999年，日本贸易振兴会进行了一次有关职工就职意识的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是大企业，在5个人当中就有2人考虑掉换工作；3个人中有2人回答“如果条件比这里好，可以考虑调离”。这项调查还表明，90%的人认为“现在提升的难度很大”；70%的人认为变换工作的目的是“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40%的人认为“工资比现在高”。这预示着，在日本企业面临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就将成为神话。

人们对企业归属意识降低，还表现在职工中途退职的增加上。据NHK电视台1999年5月31日报道，现在“青年早期退职”现象非常突出，3个人中就有1个人于3年内退职；到1999年5月31日，去年就职的大学、短大毕业生，1年内就有10万人退职。早期退职的原因是：由于是就职难的时代，所以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的特长、自己能否适应、喜欢不喜欢，先进去再说，以谋到工作为先。结果，就职企业与自己的理想、想法差距太大，需要重新寻找自己。另外，公司的习惯作法是让年青人和新进来的人多干活，多加班加点，以后一点点补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靠不住、许多大企业都倒闭，以后谁知道企业怎么样呢？这突出地显示了职工对企业不信任和共同体意识的淡薄。另外，日本人的工作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日本人给世人留下了“工作狂”、“工作中毒者”的印象，但到90年代，这一点也在发生着大的改观。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舆论调查，进入90年代，“工作志向”的日本人有了较大减少，比“余暇志向”和“工作？余暇两立”的人各少了10个百分点。如1998年“余暇志向”、“工作？余暇两立”和“工作志向”的人各为37%、35%和26%。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变化。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归属意识的变化虽然很深刻，但决不等于忠诚意识完全崩溃和彻底瓦解了。如果认为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心已经完全和永远成为过去，那只能说是个误解。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前，日本人对企业等工作场所的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3. 处于矛盾和变化中的家庭观念

90年代以来，家庭问题被新闻媒介炒得异常火爆，无论电视还是报刊都在关注和争相报道与家族有关的问题和题材，而且否定性东西占压倒多数，给人们造成了家庭崩溃的印象。如拥有卧床不起的老人而面临崩溃危机的家庭，由家庭内暴力破坏了亲子关系的家庭，因丈夫的轻浮和妻子的偷情而心不相通的家庭，因虐待幼儿而给孩子的精神带来异常的家庭，不能阻止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家庭等，在这里，家庭只被说成压迫、迫害、伤害家庭成员的装置。

确实，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未必全是负面的和否定性的。例如，“男人工作、女人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一年比一年淡薄，特别是35岁到40岁的女性赞成的仅为20.6%。（1996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1997年，被雇佣者中的女性的比率达到39.5%，已接近4成。虽然正规雇佣仍然受到限制，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大距离，但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却是事实。

家庭的个人化、多样化，也是近些年来一个较明显的变化。家用电器等的个人使用，个人用房间的普遍化，再加上单身赴任，孩子上私塾等的影响，全体家庭成员一块吃晚饭的时间减少，更别说经常沟通感情了。而且，社会高龄化不断深刻化，1992年10人中有1个高龄的人，186万人1人生活。

另外，家族的多样化也在进展。非婚单身的一人家庭、不要孩子的夫妇家庭、事实婚夫妇家庭、因离婚和婚外子的单亲家庭等，家庭形态日益多样化。

从来的家庭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如夫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共同话题较少，在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由于丈夫整天忙于工作，夫妻无法进行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做妻子的，由于长期束缚于家务中，没有机会发展自己，久而久之会使感到孤独，并转化为对丈夫的不满。这些问题再加上上述各种新观念的影响，带来了离婚的增大。

据日本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在1983年达到高峰，以后有所回落，但9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如1992年有179198对夫妻离婚，超过了1983年的179150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婚后共同生活10年以上的夫妻离异的日渐增多。这种现象表明，日本的一些家庭虽然看上去相互配合，夫妻和睦，但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情交流，只是出于对子女或经济因素等的考虑，在形式上维持着家庭。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夫妻危机不仅体现在离婚这种形式上，而且还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对日本家庭的现状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

实际上，如果只看统计的话，好像日本的家庭还是相对安定的。例如，日本的离婚率与欧美诸国相比，还是有数的低离婚率国家；还有高龄离婚，根据调查结果，“1000对夫妇中也只有4、5对离婚”。这与“激增”一词不太相符。虽然统计未必完全反映现实，但也说明了现实的变化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大。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人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以及“理想的家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1998年认为“结婚后即使生了小孩也尽量继续拥有职业”的结婚与职业“两立”的人占46%，战后以来第一次越过“即使结了婚到生小孩以前可以拥有职业”的“育儿优先”的人（38%）。另外，认为“如果结了婚的话应专心维持家庭”的“专心家庭”的人为13%。关于“理想的家庭”，1998年主张“夫妻协作”的人达到45%，大大超过了主张“性角色分担”（17%）和“夫唱妇随”（13%）的人。但是，与观念的变化不太一致的是，在现实中仍是男人很少干家务，就是女方参加工作的家庭，家务活也是以女方为主。

这说明，家庭确实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其流动变化并不快。思考家族问题之际的危险，是或者认为现在的“家庭”什么也能做到，或者宣布家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关于家庭的形象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家庭是“得以休息和安闲的场所”，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地方，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内在的矛盾和危机。

3. 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这在“新？新宗教热”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显的证明。特别是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远大抱负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关注，时常成为议论的话题。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机的留言电话和因特网进行犯罪，许多女大学生甚至女中学生为追求时髦和高消费而卖淫，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惊呼起“女中学生亡国论”。

还有，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怕吃苦而不愿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而急于找一个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公司等就职。这在基础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中外国人多于日本人的现象。

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年青人远离理科，理工科志愿者逐年减少。1986年，大学的理工科学部的志愿者数为约74万人，占志愿者总数的25.6%。但是到1993年却下降到19.5%，4、5个人中就减少1人。

志愿者人数下降的话，必然优秀学生的入学率也减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理工学部的学部长57人为对象进行紧急调查，其中77%的人认为“优秀学生变得不愿意理工科的学部”。关于其原因，举出了“现在的大学考试不得不考虑偏差值，很难真正选择有兴趣、有适应性的专业”、“与文科比起来因实验等很忙，被敬而远之”、“文科就职后在企业待遇好”等。

就是学理工科的人，在毕业后也尽量远离制造业。1988年，理工科大学生和硕士生进制造业比率为约53%，为战后最低。1993年度为56%，也没有大的增加。关于理工科毕业生远离制造业的原因，新技术事业团的川崎雅弘专务理事指出：“（战后）制造业的位置非常高，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的技术（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进入80年代变成富裕的社会后，比起志向于从来的技术、产业主义还不如更快地赚钱。这在泡沫经济期更加扩大了。例如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基准内，30多岁的人的工资差3成左右。这样，在金钱本位主义的社会中，包括家长在内，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来不如干别的人增加了。”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年轻人贪图享受的实质。

1. 工作场所价值的降低

自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伴随日本式经营制度的形成,日本也进入了高度组织化时代。充分就业使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拥有自己归属的小集团,终身雇佣制决定了工作单位内部的关系是日本人主要和长期的社会关系。由于个人只能从自己的工作单位获得所需的一切,如地位、金钱、福利等,所以单位的性质、规模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日本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单位内部承担的角色也就成了她们最主要的社会角色。上面的功能和特点,使工作场所成为一个功能复合体,造成了日本人对单位的完全依附性。

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改革,将迫使日本企业向一直给职工提供安全感的劳动、工资和保险制度开刀,并改革“日本式经营模式”。毫无疑问,现在的改革是合理的。因为从来的工资体系的特点在于:对年轻职员进行教育投资,在其成为中间层后做出超出工资的贡献,到中后期发生贡献和工资关系的逆转,个人和企业以此维持长期的贡献和工资的平衡。但在不能保证中高年职工的高额工资的不景气时期,有必要缩短决算期间。即对年轻从业人员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投资,但尽早将其收回结束长期决算,对管理者以后也要移向短期决算。这是推进日本型年俸制的理由,是合理的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减少年功的成分,向能力主义倾斜。

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使自我的价值得到尊重和肯定。结构性改革得推行,将使许多日本人脱离原有的集团和集团的保护,开始自己到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这对习惯于依赖他人的日本人来讲,确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这样得背景下,日本人对企业等的归属意识以及工作观等,还会继续发生变化。

一些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上班族的加班时间明显减少,下产班后马上回家的越来越多。另外,比起为企业等卖命来,重视自己的余暇生活,在余暇生活中寻求人生意义的人有了很大增加。可以预料,随着各种改革措施的到位,日本人脱离工作单位的倾向将逐渐强化,对公司等的归属意识将日益淡化。未来日本人将摆脱对公司的全面依附性质,个人的自主性会日益加强。同时,公司等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也将日益减弱。

21世纪的日本人将面对更多的实际问题,其心理需求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格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而演变,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社会现状、未来发展的反应的复杂性。由于对企业等共同体渐渐失去信赖,对社会关系的需求有可能使日本人追求其他的人际交往方式。

但是,对企业归属意识的减弱,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大和综合研究所在1996年4月曾设立了一年契约的“特别专门职”,以现在年收入的2—5倍的年俸对课长以上的对象进行募集,但应募的为零。山一证券集团也在1995年设立了完全年俸制,但采用也为零。野村综合研究所虽采用了32人,但从本企业内转来的不过数人。另外,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关于“理想的工作条件”的调查,1998年举出“能与同事愉快地干的工作”的占第一位。这说明,人们还在留恋习惯了终身雇佣制,还是非常重视与同事的关系的。

总之,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打破了日本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步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价值观势必会继续失落,对企业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2. “家”意识的强化

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以公司为家”、“工作单位至上”的价值观将逐渐淡化,人们将越来越多地离开“公司的舞台”而回归家庭,“以家为家”的价值观将逐渐升值。

日本人曾有过重视家族的时代。远的不说,就是战前的日本人“家”意识也是很浓厚的。正是“家”意识与“忠孝”相连,而“忠孝”又与天皇和国家意识相连,“家”意识才成为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支柱。但随着战后改革的实行和新宪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不仅使“家”与“国家”的传统联系被切断,而且二者的价值功能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介于“家”和“国家”之间的企业等共同体价值的上升。

但是,90年代以来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使人们和企业等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动摇。日本人与公司关系的弱化,势必导致他们重新审视和看待家庭的价值,将家庭视为回避社会风浪的“宁静港湾”。到21世纪,随着社会变化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和人际关系距离的拉大,日本人的温情感和安全感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家庭,家庭将成为他们获取人间温情的基本单位。

日本人回归家庭,势必导致“家”意识的加强。但是,问题是在回归家庭,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过程中追求什么。对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加地伸行认为:“虽然日本国宪法提倡个人主义,但这成了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因提出个人主义,无论在法律还是在社会还是道德方面,都向家族主义解体的方向推移。……这样的话,结果我们日本人所依据的只能是传统的儒教式家族主义。”在这里,总让人自然地感到战前家族制度的影子。

在传统的“家”观念中,家的本质不是物质的居住和生活场所,而是由血统、家世组成的,是有生命的、有精神的严肃的存在。家既是生命之本,又是生命的延续,是将祖先与父母、子孙连为一体的连绵不断的综合体。这恰恰与战前的“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如果试图通过提高家庭观念来恢复这种“家”意识,那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

未来的家庭意识,应通过强调加强夫妻和亲子关系,以家庭内平等和互相尊重,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形式出现。这样,才能使人们在家庭中品尝到真正的温情、和睦和幸福,并有效防止由“家”意识的强化滑向新国家主义。

总之,确立自我,回归家庭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价值观的一种发展趋势。

3. 性“解放”意识的进一步蔓延

进入90年代,不知是否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人的性意识也呈现了“崩溃”的样态,一发而不可收拾:从90年代,出现了全裸体的解禁(1991年),从青年女性“少女服”到“援助交际”的性问题化(1993年),海外黄色像热(1995年),“失乐园”热(1997年)等,在性风俗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热”。

90年代在性风俗方面的划时代事件,是1991年对裸体限制的解禁。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性表现和描写能容许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能否看到阴毛一直被作为一个基准。但是,1991年2月发行的口可南子的写真集中,阴毛清清楚楚地拍照出来,但没有被适用猥亵罪。进而同年11月,人气绝顶的演员宫泽利枝发行了裸体写真集,卖了150万部以上,更加速了裸体照解禁的潮流。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裸体热。

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的性风俗,从“电话俱乐部”到“援助交际”,特别是被称为“女子高中生”的年轻女性的性方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1996年10月,东京都公布的有关调查表明,向“电话俱乐部”打过电话的女子中、高中生为25%,主要通过在这里见面而进行的男性和年轻女性的“援助交际”(包括买卖春)的经验率为3%。这样,“援助交际”发展为政治问题。1997年10月,东京都议会制定了《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修正案》,其中载入了“买春等处罚规定”。

当然,“援助交际”等所提出的问题,既不仅是性风俗的问题,也不能还原为“青少年健全育成”的问题,毋宁说这是理解世纪末日本的一个关键词。“女子高中生的性”的问题,是日本社会整体的问题。

对“援助交际”等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既有站在女性解放论的立场批判买卖春和性的商品化的,也有主张“孩子的性”应由其自己决定,大人不应保护和限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说,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关于性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关于“婚前性交往”的调查,1993年回答“如果是深深相爱男女可以发生性关系”、“如果已有婚约关系的话可以发生性关系”、“办完结婚仪式以前不应发生性关系”的人分别为35%、23%、32%,但到1998年一下子变为43%、23%和26%。

21世纪就要到来,日本人是否也会迎来一个“性的新世纪”?难以妄下论断。但是看看眼下的势头,恐怕谁也不能阻挡住

“性解放”的潮流。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